

关于“庸俗经济学”的方法论探究

段艳芳¹ 石越²

(1.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2; 2. 中央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经济学方法论是对经济学方法的理论研究。经济学自产生以来,每一种理论的创建、学说观点的提出,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方法。马克思将经济学划分为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两大发展阶段,并对庸俗经济学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了批判。在经济学体系日益完善、分支日益细化的今天,如何看待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论断显得尤为重要,它关系到我们对待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态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构建。本文从方法论的角度切入,分析庸俗经济学形成的原因,探讨其方法论特征,并对其现代适用性给予客观公允的评价。

关键词: 方法论; 庸俗经济学; 现象描述; 辩护性

中图分类号: F0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049(2017)01-0018-07

一、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脉络

方法论不同于方法,它是从总体和一般性的角度对方法的原则、形式和规则进行探讨,其中不仅包含着对方法的总结和概括,还涉及对各种方法之间相互关系的深入反思。经济学方法论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自经济学产生以来,各派经济思想、经济理论的提出都离不开方法上的支撑,这些方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共同构成经济学的方法论体系。从方法论的层次上来说,哲学方法论是较为一般性的方法论,经济学方法论是哲学方法论的具体化和特殊形态,它受哲学方法论的根本影响,随着经济学理论的完善而发展。

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才得以确立的,而关于经济方面的思想却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已广泛流传,尽管这时期的思想家大多致力于创立一个有关社会的综合性理论,涉及社会的所有方面和所有问题,经济学在这种理论中既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也不是一个独立的部分,但在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初级的方法,如色诺芬对自己亲身经验的总结概括、柏拉图在理想国的构建中对现实具体事物的推演、亚里士多德在实体论基础上对认识论和逻辑学的运用以及托马斯·阿奎那从经典著作出发对自己理论体系的演绎,这些方法为后来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世纪后,封建社会逐渐没落,商人在与政府的联盟中发展起来,获得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重商主义转变成社会的主旋律。重商主义者与经院学者不同,“这是个从不同观点和不同角度看待工商业事实的阶级”^[1],他们从事商业活动,维护商人阶级利益,其理论观点来源于商业活动中实际经验得来的一般性道理,经验总结是重商主义者的方法论特点。重商主义政策在欧洲推行二三百年来,积累了大量的商业资本,随着这些商业资本被投入生产领域变为产业资本后,对经济问题的研究由重商主义的

收稿日期: 2016-11-29; 修回日期: 2016-12-13

作者简介: 段艳芳(1989—),女,内蒙古包头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和世界经济史; 石越(1988—),女,山东新泰人,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和民族经济学。

流通领域开始转向生产领域。最早对生产领域进行研究的是英国的威廉·配第,配第深受培根归纳逻辑的影响,重视收集各种实际的经济材料,力图从各种特殊的经济现象中归纳出一般性的联系,初级的劳动价值论就是在这样的方法下产生的,这比重商主义者的“就事论事”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进步,重商主义者的经验总结法在配第的归纳法中得到发展。

法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与发展晚于英国。17世纪下半叶,柯尔培尔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严重损害了法国农业的发展,促使一些思想家开始探索本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其中布阿吉贝尔和魁奈就是这时期的重要代表,他们批判重商主义,呼吁重视农业生产,形成法国的重农学派。在方法论上,重农学派深受当时流行的自然法哲学家的影响。布阿吉贝尔信从自然规律,认为经济活动也受自然规律的制约,在对自然规律一般性认识的大前提下,以总体演绎法展开对各种具体政策和观点的评论;魁奈受到笛卡尔理性主义方法论的影响,结合启蒙学者的一些观点,认为经济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揭示经济过程中的自然秩序,而理性是揭示经济规律的基本条件,这种以自然秩序为大前提、突出理性作用的体系必然强调分析演绎的方法。因此,演绎法在重农学派的理论中发展起来。

基本的经济思想、经济分析方法虽已经形成,但还处于初级的、零散状态,亚当·斯密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系统考察中,创立了古典经济学体系,形成了自己的二重方法,经济学方法论在学说体系的完善中开始走向系统化。斯密吸收借鉴了配第、魁奈的经济学说和方法,他赞同自然秩序的思想,同时重视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考察,注意收集各种实际的经济材料,企图在比较、归纳、认识材料的过程中分析找出一些本质性的、一般性的因素,他的方法是配第和魁奈的结合,在理性分析中并不排斥对经验材料的总结,但他又比前人略高一筹,表现为在归纳、演绎基础上运用抽象分析法对本质概念进行规定,如对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当然,斯密的方法论体系也存在着缺陷,表现为缺乏分析基础上的综合,他认识到了经济现象的本质因素,但并没有将这些本质性因素综合起来进行系统性分析,相反,在对一些问题的阐述中,斯密走向了与抽象演绎法相对立的现象归纳法,把现象间的表面联系当做认识的终极目标,如他承认劳动价值论,但并未将劳动价值论贯彻于对工资、利润、地租的分析,而是转向以“三种收入”来规定价值,以分配领域的现象归纳代替对本质的分析,之后他又以流通领域的“购买到的劳动”决定价值对价值理论进行进一步补充,对价值的分析从生产领域退回到了分配、流通领域。

斯密的二重方法使得其学说中出现了被后来学者所总结的“三种价值理论”的矛盾体系,成为经济学研究分化的开端。斯密之后,李嘉图从劳动价值论角度运用抽象法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李嘉图不同,萨伊批判李嘉图的抽象体系,否定劳动价值论,他从要素价值论角度运用经验主义的现象归纳法扩展了斯密的体系,提出了“三要素价值论”及“三位一体的分配论”。两条道路、两种方法的研究体系基本奠定了后来经济学发展的走向,马克思发展了李嘉图体系,西尼尔、巴师夏等人则在萨伊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之后经济学的方法论基本上都围绕着抽象演绎法与经验主义归纳法展开争论,特别是德国历史学派兴起之后,他们反对英法古典经济学体系对于一般性理论的追求,强调德国历史的特殊性,在方法上他们否定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个人主义假设和演绎主义方法,采用经验归纳法努力使经济学对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时期敏感^[2]。这一方法受到门格尔的攻击,门格尔认为任何科学都必定基于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假设,历史学派的经验主义立场存在着内部不一致性,所有的经验调查都依赖于同一性、连贯性和可测性这样的非经验假设,归纳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具有可操作性^[2]。门格尔主张抽象演绎法,以个人作为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单位,从边际效用价值论的角度建立经济学体系。

新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受旧历史学派的影响,注重历史特性问题,企图在方法论上避免旧历史学派经验归纳法的缺陷,但由于他们没有形成完善的方法论体系,最终也没能挽救历史学派的命运。而奥地利学派的诞生,却使得门格尔所主张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生存了下来,抽象演绎法发展,导致“边际主义出现后全用演绎法”的局面^[3]。但这种抽象演绎法显然已不具有斯密、李嘉图时代的特征,他们不是从大量的现实材料出发抽象出一般运行规律,然后演绎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活,而是以单独的个人

作为出发点,以人心理活动的某方面特征为根据,推论出他们的经济体系,包括后来的数理方法、计量方法也基本上是以这样的框架,不过是通过量的变化、数学公式的演算得出的结论。

二、何谓“庸俗经济学”

“庸俗经济学”这一概念最早是由马克思提出来的。经济学说的发展、经济思想的演变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指出“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4]。恩格斯在为莱茵报写的《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中,进一步指出“在这本书中作者怀着愤怒的心情,把现在流行的乏味的经济学,或者他极其恰当地称之为‘庸俗经济学’的经济学,与它的古典的先驱(到李嘉图和西斯蒙第)对立起来。”^[5]庸俗经济学就是对19世纪上半叶英、法、德等欧洲国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统称,其中包括法国的萨伊、巴师夏,英国的麦克库洛赫、西尼尔、穆勒父子以及德国的李斯特、罗雪儿等人,马尔萨斯虽然不属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但不可否认他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化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古典经济学庸俗化的过程中,“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精明的、贪利的实践家,他们聚集在庸俗经济学辩论论最浅薄也是最成功的代表——巴师夏的旗帜下;另一派是以经济学教授望自负的人,他们追随约·斯·穆勒,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4]以这样两派的划分,马克思展开了对庸俗经济学理论及方法论上的批判。

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庸俗经济学以及对庸俗经济学内部的划分,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赞同,他们进一步认为庸俗经济学不仅包括马克思所说的部分,西方经济学后来的发展对资本主义体制进行了系统论证和辩护,还包括西方经济学之后的发展也属于庸俗经济学的内容;而另一些学者不赞同马克思的划分,他们认为古典经济学应该包括斯密到马歇尔的所有部分,是马歇尔开创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时代,经济学从此走向了新的发展方向,这种争论持续至今。

将1830年作为古典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的分水岭,有如下原因。

(一) 经济学理论上的大论战导致李嘉图学派解体

李嘉图的理论提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除了赞扬他的人外,也有一些人对他的著作提出异议。19世纪20到30年代,针对李嘉图的价值理论,英国经济学界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论战的一方是反对李嘉图理论的马尔萨斯派,另一方是拥护李嘉图学说的约翰·穆勒、麦克库洛赫派。关于这场论战,马克思写道“从1820年到1830年,在英国,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活动极为活跃。这是李嘉图的理论庸俗化和传播的时期,同时也是他的理论同旧的学派进行斗争的时期。”^[4]

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将劳动创造价值与等价交换原则作为其体系的中心定理。马尔萨斯抓住了李嘉图体系的矛盾并对其展开了批判。首先,既然李嘉图认为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创造的,并且实行等价交换,那么商品的价值就应该全部归生产商品的劳动者所有,可李嘉图又认为利润是合理的,那利润从何而来?其次,既然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的劳动所创造,价值量取决于劳动量,等量资本投资于不同企业时所雇佣的活劳动并不相同,所生产的价值和利润率就不能是相同的,可实际生活中为什么却呈现出大体相等的状况?

马尔萨斯对李嘉图体系的批判准确地揭示了李嘉图体系的矛盾,论战的结果导致经济学方法论出现两种发展方向:要么摒弃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以经验主义的现象归纳法开创新体系;要么以抽象演绎法进一步解决李嘉图的矛盾。萨伊开创的效用价值论成为第一条道路的开端,效用价值论是对斯密二重体系中三种收入价值论和现象归纳法这一分支的系统化,马克思则是对劳动价值论和抽象法这一分支的系统化。萨伊以效用价值论避免由劳动这一因素决定价值,以“三分法”展开自己的整个学说体系。李嘉图的弟子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库洛赫将萨伊的要素价值论引入对李嘉图缺陷的辩护中,穆勒在萨伊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交换,形成他的“四分法”,把资本和劳动的交换说成是简单的商品交换来解释第一个矛盾,对于第二个矛盾他用资本生产力论予以补充,他既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又发展了萨伊的体系,其方法论体现出折衷主义的特点;麦克库洛赫在萨伊的基础上也进行了尝试,他认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是借贷关系,资本家贷出商品,由工人借入,工人付给资

本家的利息就是利润的来源,对于第二个问题,他发展了穆勒的资本生产力论。

穆勒和麦克库洛赫难以抵挡马尔萨斯派的进攻,同时国内又出现了以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为依据的社会主义者,在这样的情况下,穆勒和麦克库洛赫不仅没能发展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体系,而且以要素价值论的现象描述取消了李嘉图抽象体系的合理因素,掩盖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最终导致李嘉图学派走向解体,庸俗经济学发展起来。

(二) 现实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的演化

19世纪30年代之前,资产阶级尚未完全取得统治地位,资产阶级与封建领主、地主的矛盾是他们面临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需要与工人阶级联合对抗土地贵族阶级,因此,古典经济学还能够深入到资本主义内部去考察所有的经济关系,在以劳动价值论为中心批判土地贵族阶级和揭露地租不合理性的过程中,得出工资与利润、利润与地租对立的结论。19世纪30年代之后,资产阶级逐渐取得统治地位,1830年法国爆发七月革命,推翻了复辟的波旁王朝,社会舆论倒向资产阶级自由派,法国开始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统治。受法国七月革命的冲击,英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要求参与国家管理,1832年英国进行议会改革,议会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虽然改革的结果仍然是土地贵族掌握着议会权力,但工业资产阶级进入到了议会,这为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政治上的变革,进一步推动了经济上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逐渐深入到各行各业中,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为经济学由古典转向庸俗提供了社会经济根源。

随着资产阶级取得全面统治地位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逐步深入,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日益凸显,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演化成社会的主要矛盾,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也逐步发展起来,并且出现了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理论与运动互相结合,威胁了资产阶级统治秩序,三大工人运动是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争取自身利益的集中体现。早期社会主义者以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为依据揭示劳资矛盾,批判资产阶级,维护无产阶级利益,这些社会主义者对李嘉图体系的坚持与运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学庸俗化的转向。

资本主义经济学必然不能沿着古典经济学道路继续发展,旨在迎合资产阶级利益,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掩盖资本主义阶级冲突的庸俗经济学应用而生,他们既不赞成古典经济学也不反对社会主义学说,通过方法论方面的变化建立起了一套学说体系,并影响了后来经济学的发展。因此,1830年成为了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三、庸俗经济学的方法论特点

一些学者认为,将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永恒的是庸俗经济学的根本特征,但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的”^[4]。因此,不能以“是否将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永恒的”作为庸俗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庸俗经济学之所以不同于古典经济学,根本在于其方法论上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 以经验主义的现象归纳法代替抽象演绎法

正如马克思所说,古典经济学研究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而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4],“庸俗政治经济学愈是肤浅地抓住现象的表面,仅仅用一定的方式把这种表面现象复制出来,现象归纳便是庸俗经济学的首要方法论特征。

从斯密建立系统的经济学体系开始,经济学的方法论总体呈现出两个分支:一个是李嘉图式的抽象演绎法,一个就是庸俗经济学的经验主义现象归纳法,这两种方法在斯密的体系中都有所体现。抽象演绎法首先就是大量收集现象材料,然后对材料进行比较,通过分类、归纳来认识这些材料,进而运用分析找出其本质性的因素,从本质上规定概念,最后运用综合对各范畴进行统一的规定,运用演绎

建立论述体系,是包括占有材料—比较—分类—归纳—分析—综合等一系列思维过程的方法体系,其中归纳和分析都是抽象法的重要因素,但它们并不能单独构成抽象法。而现象归纳法是描述现象间表面联系的方法,它也涉及比较、分类、归纳等思维形式,之所以区别于抽象法,是因为“它把认识层次局限于这些初级思维所达到的成果,而不是进一步深化,特别是不能进行分析”^[7]。

斯密、李嘉图运用了抽象演绎法,但他们的抽象仅仅停留在分析的层次上,没有对所有范畴进行统一的考量,使得其体系中出现了相互矛盾的状况。而庸俗经济学家对经济范畴研究往往只局限于归纳的层次,他们把现象间的表面联系当做本质,把诸个别事实归纳为一般事实,以各个相互联系的环节构成整个经济体系。这种方法论可以从萨伊的体系中看出,萨伊认为商品的效用是其价值的基础,价值渊源于商品的效用,而商品的效用是由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土地)共同创造的,因而,价值也是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这三个方面共同作用和协力的结果,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既然价值是由三种要素创造的,那么分配中拥有这三种要素的人就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工人—工资、资本家—利润、地主—地租。他以这样的方法完全抹煞了本质上的区别,劳动、资本、土地被当做三个平行的要素出现在价值的形成过程中,不顾它们各自作用的不同,这导致了分配论中工人、资本家、地主似乎以平等的地位参与着分配,这就是萨伊“三分法”的体系,而这个体系正是其现象归纳法的杰出体现。

萨伊之后的庸俗经济学家,他们在方法论上基本也未能突破萨伊体系。约翰·穆勒更是受到孔德实证主义的影响,在方法论上进一步发展了经验主义的现象归纳法。

(二) 企图以折衷主义方法论调和经济矛盾

折衷主义是庸俗经济学方法论的第二个基本特征。庸俗经济学产生于李嘉图之后,受李嘉图体系固有矛盾的推动,早期的庸俗经济学家更是以李嘉图学派的弟子为主,这使得庸俗经济学家不可能不受到李嘉图理论学说的影响。但庸俗经济学兴起之时,劳资对立的状态已经形成,工人运动兴起,社会主要矛盾也由工业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转向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折衷主义方法论由此而生。“1848年大陆的革命在英国产生了反映。那些还要求有科学地位、不愿单纯充当统治阶级的诡辩家和献媚者的人,力图使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于是,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最著名代表的平淡无味的混合主义产生了”^[4]。

折衷主义的方法论最初体现在詹姆斯·穆勒的形式逻辑中。穆勒一方面试图继续李嘉图的思路,维护李嘉图体系的绝对理论形式,另一方面他还要试图解决李嘉图体系的矛盾。对于李嘉图学说的第一个矛盾,詹姆斯·穆勒认为雇佣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换类似于简单的商品交换,工人和资本家对产品都有一部分的所有权,在交换中,工人将其所有的部分出卖给资本家,资本家付给工资,工资与工人所有的产品部分价值相等,因此,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交换还是等价交换;而对于第二个矛盾,詹姆斯·穆勒认为劳动创造价值,价值就等同于劳动,而资本是劳动的积累,也具有生产的能力,能够生产价值,所以会出现陈酒贵于新酒的情况,这并没有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相违背。

詹姆斯·穆勒之后,麦克库洛赫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折衷主义的方法,在劳动创造价值的前提下区分了三种不同的价值:实际价值、商品间交换的相对价值、同劳动相交换的商品的相对价值,试图以此解决李嘉图体系的矛盾。到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时期,折衷主义的方法论开始走向系统化,先接受了李嘉图的学说,之后又接触到了庸俗经济学家的观点,同时他又对早期社会主义学说产生兴趣,“他从这些来源中吸取的想法形成了一个智力困境,因为他试图将这些思想与早期深刻影响他的边沁思想和李嘉图主义相融合。”^[8]

约翰·穆勒改造了李嘉图体系,他将商品分为三类:稀少商品、工业品和农业品,其中稀少商品的价值由供求关系决定,工业品由生产成本决定,农业品则由最高生产费用决定,这里工业品的价值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在三种价值理论的作用下,约翰·穆勒认为,在分配中,资本是节欲的表现,利润是节欲的报酬,工资是劳动的报酬,地租是土地私有权的报酬,这是对萨伊现象归纳下“三分法”体系的进一步发挥。而对于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是好的,只是分配出了问题,主张对现行的分配制度进行改良,而不是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约翰·穆勒的学

说体系正是其折衷主义方法论的体现,对后来资本主义经济学中的改良思想产生影响。

(三) 以否定劳动价值论的形式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

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是所有庸俗经济学家所共有的特征,“庸俗经济学家(应该把他们同我们所批判的经济学研究者严格区别开来),实际上只是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翻译受资本主义生产束缚的资产阶级生产承担者的观念、动机等等。”“他们把这些观念、动机翻译成学理主义的语言,但他们是从资本家(社会的统治部分)的立场出发的,因而,其论述不是朴素的和客观的,而是辩护论的^[6]。

这种辩护性的论断普遍存在于庸俗经济学家的体系构建中,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以劳动、资本、土地的并列排序得出分配论中互不影响的三个部分,马克思对此评价道“资本—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就是把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切秘密都包括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形式。”^[9]詹姆士·穆勒在萨伊“三分法”基础上扩展的“四分法”以及其资本生产力论,使利润成为资本家的资本在生产中所创造并归资本家所有的部分。麦克库洛克更是不顾现实的矛盾,提出劳动创造价值,但商品与劳动相交换时这个原则又不起作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是借贷关系,资本家贷给工人商品,工人付给资本家利息,对资本家来说得到的就是利润。西尼尔的“节欲论”、巴师夏的“和谐论”、约翰·穆勒对三种商品及各自价值规律的论述,基本上都摆脱了劳动价值论的框架,抹杀了劳资对立的社会矛盾,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提供了论证。

“由于在现实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完全被掩盖了,一切均以歪曲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在实际上决定着资本家的行动,成为他们的动机,并反映在他们的意识中。正因为如此,庸俗政治经济学就以学理主义的形式来直接表达这种资本家的动机、观念和意识。”^[6]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理论的概括,正是庸俗经济学辩护论方法的最好总结。

(四) 以心理因素作为论证的基本前提

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其研究对象必然涉及到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的心理因素又是影响人之行为的重要因素,经济学的研究当然也少不了对心理因素的解读。从经济学产生到古典经济学时期,虽然经济学家也会谈到心理因素,但从来没有像庸俗经济学家一样提到这样的高度,有些庸俗经济学家甚至把心理因素作为其理论构建的基本前提,以致后来形成了所谓的“心理学派”。

庸俗经济学家放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为了说明价值的来源,萨伊引入了“效用”的概念,效用就是价值,有效用的东西就是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或能满足人们的嗜好和虚荣,这样,效用或价值就成了人们的一种主观感觉、一种心理上的东西。到了西尼尔时期,他直接把价值确定为“产生愉快或防止痛苦”的心理感受,并以此作为前提,他认为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是人们心理上的共性,财富的生产就是人们节制现在的欲望,对未来欲望的追求。巴师夏在西尼尔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由财富变为人,认为避免痛苦和满足欲望是人之本性,欲望的满足可以称作效用。

庸俗经济学家将心理因素作为经济学研究重要基础的做法,既是其现象归纳法的表现,又大大扩展了现象法的使用范围,以非本质的联系代替对本质的探索,有利于其辩护性理论的提出。

四、结 语

本文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了庸俗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区别,探讨了庸俗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特征。庸俗经济学在对李嘉图体系缺陷的探讨上发展起来,为了避免李嘉图的矛盾,他们逐步抛弃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在方法上以现象归纳法代替了抽象演绎法,以对现象表面联系的归纳代替对本质的深入探讨。这里对庸俗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是说要批判它、否定它,庸俗经济学的某些结论是具有合理成分的,其现象归纳法也不是错误的,没有对现象的归纳就不会有对本质抽象,现象归纳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这些合理成分的存在并不等于说它们就不是“庸俗”的经济学了,对待庸俗经济学要有正确的态度,既要看到其理论与方法的合理成分,又要避免其“庸俗成分”的误导。

“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也因此,任何经济理论都有它的‘历史相对性’”^[3]。不管是马克思的理论,还是庸俗经济学家的学说,甚至现在被看作“普世价值”的西方经济学,他们都是特定环境、条件下的产物,一旦这种环境、条件发生变化,这些理论就不再具有普遍适用性,但其中所包含的经济分析

方法不同,它们会长期存在,用于指导对现实经济矛盾的分析。因此,我们在对庸俗经济学分析过程中,不能仅仅停留于其方法和理论的缺陷,方法中的合理成分才是我们需要探索并保存的重要东西。

当代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并论证经济规律,解释并解决现实经济矛盾,中国经济学的方法论也要与经济学研究的目的相配套。中国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主体与主题不同,现代西方社会以资产阶级为主体,西方经济学以资产阶级的视角探讨资本的统治与增值;中国社会以劳动者阶级为主体,中国经济学研究主题则主要是以劳动者阶级的视角探讨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的解决。同时,中国的经济矛盾与西方经济矛盾也不同,具有国度的特殊性,体现在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等多个方面。因此,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不能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趋同,完全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方法体系只会使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构建陷入误区,不能达到指导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还需要对经济现象的本质进行探讨,根据中国现实经济矛盾不断推进,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对创新的需求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强烈而紧迫^[10],这种创新不仅体现在经济实践上,更体现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上,在这种创新的过程中,西方古典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甚至庸俗经济学方法论中的合理成分都值得我们借鉴。

参考文献:

- [1]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29.
- [2]杰弗里·M·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 [3]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 [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05.
- [6]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
- [7]刘永佶.政治经济学方法史大纲[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83.
- [8]英格里德·H·里马.经济分析史(第七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28.
- [9]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21.
- [10]程恩富.论新常态下的五大发展理念[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6(1):1-7.

(责任编辑:王顺善;英文校对:曹姗姗)

Exploration about the Methodology of “Vulgar Economics”

DUAN Yanfang¹, SHI Yue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is a theoretical study of the economics method. Since the emergence of economics, the creating of a theory, the pointing of a theory view, there are methods to adapt to their accompanying. Marx divides economics into two stages of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economics and vulgar economics, and criticizes the vulgar economics from the angle of methodology. In the branch of economics system is increasingly perfect, refinement of today, how to treat the judgment of Marx of vulgar economic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t relates to the attitude that we treat the modern western econom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economics which has China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hodolog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of the formation of vulgar economics,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methodology, and gives an objective and fair evaluation of its modern applicability.

Key words: methodology; vulgar economics; phenomenon description; defensibility